

# 琐议“保卫鲁迅”

□陈漱渝

2025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89周年。89年来，有关鲁迅的话题常新，他的文学、思想的当下性不言而喻。流量为王的时代，总有人挖空心思要做些吸引眼球的文章，虽然都是“蚍蜉撼大树”，但仍值得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李何林先生提出“保卫鲁迅”，如何理解？有何意义？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特此撰文，供羊城晚报独家刊发——

## “保卫鲁迅”始于李何林

大约是1986年，业师李何林先生被确诊为骶骨癌。他自知患不治之症，便提前写了一份遗嘱，总结一生，其中有两件事让他很感欣慰：一是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批人才，二是“保卫鲁迅”。

李先生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当时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出版局下达了一份文件，给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下达七项任务，其中第三项是：“对香港和国内外出版的周作人、曹聚仁等人歪曲鲁迅的作品进行批判。”时为1975年12月5日。

因为曹聚仁在他的《鲁迅评传》中强调鲁迅是“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赢得了周作人的击赏，称之为“特见”，所以他们当时被鲁迅研究界视为错误倾向的代表人物。

李先生曾经解释，说他所提出的“保卫鲁迅”并非神化鲁迅，而只是维护鲁迅的正确方面，不至让人误解、歪曲和诋毁。

早在1929年，李先生即编选了《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及这两本书。鲁迅刚去世，天津《大公报》曾发表短评，讽刺鲁迅的笔调“尖酸刻薄”。李先生及时批驳，指出鲁迅之笔是“深刻锐利”，并在副标题中称自己的文章是“愤言”，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情感倾向。1940年，李先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称鲁迅与瞿秋白为1917年至1937年中国文学界的两面旗帜。1980年4月，李先生创办了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初衷就是为鲁迅和冯雪峰辩诬，因为当年此类文章没有发表的平台。

李先生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干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为人耿直正派；虽偶或固执己见，但决不趋时媚俗。所以，鲁迅研究界的同人虽不全部认同他的观点，但对他的为人和贡献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

## 钱钟书夫妇为什么对鲁迅有所非议？

李先生去世之后的情况有所变化。有学者认为鲁迅自是参天大树，非蚍蜉所能撼动。如果以“保卫鲁迅”者自居，容易将不同观点当成“敌情”，置其于异端邪说的位子；对于鲁迅研究领域出现的不同说法，宜以“平常心”待之。

“平常心”是一种容易被普遍接受的提法，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又大相径庭。这一概念源自中国禅宗的哲学观，主张自然无为，心无执念，在各种境遇之中都能保持从容淡定。“平常心”与“是非感”不应相互排斥。以平常之心行学术之辩，就能遏制偏激情绪，恪守学术规范，成为健康竞争的润滑剂。但如果把“平常心”当成“围观”“吃瓜”“明哲保身”的理由，那就会违背鲁迅的教导：“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着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在鲁迅研究领域，产生观点分歧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鲁迅是一位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志向的作家，但文明之间有冲突，社会当中有各色人等，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尽相同的利益诉求，对历史和现实会持不同的看法。所以，对鲁迅的评价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局面。鲁迅研究学科正是在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中发展的。学术界需要学派纷呈，应该警惕的是圈子和宗派。

还有一个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对鲁迅看法的分歧，那就是鲁迅作品中臧否评骘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人物，包括中国近现代人物。虽然鲁迅不仅善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人”，但毕竟不能以鲁迅在特定历史情境和语境中对人物的评价为“盖棺定论”，比如鲁迅对梅兰芳、李四光、陈翰笙、邵洵美等人的评价，就历来有所争议。

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援引了一篇《钱基博之鲁迅论》。钱基博是一位文学史家、国学家、教育家，钱钟书之父。但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鲁迅“颓废，不适用于奋斗”，其著作“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并将鲁迅与徐志摩并列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以上评论“评”得连鲁迅自己都不想再说什么话了。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鲁迅笔下也是一位以“寡妇主义”治理女校的人物，所以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对鲁迅的评价有所保留，并非事出无因，不难理解。

## “无意失真”与“有意作伪”

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还经常发生在史料的征用方面，其实质是“求真”和“作伪”的交锋。当然，“求真”者也可能由于知识局限或记忆局限而产生“无意失真”，“作伪”的动机更是形形色色。以至于当下拍卖市场不断出现鲁迅信札或书法的赝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近些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伪造的鲁迅语录，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是为了浇心中的块垒。有人伪造朱安致鲁迅书信、鲁迅逛琉璃厂狎妓日记，这种做法的性质就只能用“恶劣”二字来概括了。

有些学者跨界谈鲁迅，也闹出一些笑话。比如经济学家家驹，连“羽太”“羽太寓”“羽太信子”“羽太重九”的区分都拎不清，把一个羽太信子说成两个不同的人，如此水平，竟敢撰文“破解”鲁迅日记的密码，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妄人”了。

此处提到的羽太信子、羽太重九，涉及1923年7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事件。这件事距今已102年，但仍为不少读者所关注。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突发事件，兄弟双方均持不辩解态度。

1924年6月11日，鲁迅从砖塔胡同回八道湾取书籍器物。鲁迅当天日

记的记载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移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日记可与徐耀辰(祖正)当天日记相印证。徐耀辰和张凤举(定瑛)是周作人的朋友，包括羽太重九，三位当天在场，羽太信子“多移语”，这些移语的内容鲁迅认为是“捏造”。

至于重九，即羽太信子之弟，周作人的妻舅，也就是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的“H”君——据日本汉学家中岛长文考证，1923年7月重九在日本，不可能成为周氏兄弟最初失和的目击者。

而且，据我所知，羽太重九和鲁迅的关系十分友善，这种友善关系一直持续到兄弟失和之后。1925年8月，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之职。重九驰书慰问，称其为“兄长”，对鲁迅的人格表示敬重。

所以，在我看来，要彻底澄清周氏兄弟失和的细节已无可能，过度关注亦无必要。对任何作家的评价主要是取决于他的作品，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个人隐私。在周氏兄弟失和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大同小异，将来可能还有人披露所谓新材料，但在没有确证支持的情况下，无论任何人发表任何说法，都不可能改变对鲁迅的总体评价。

鲁迅在遗言式的杂文《死》中写道：“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鲁迅逝世已经89年，不仅至今没有被人忘记，而且还拥有了比生前更多的中外读者。因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所以常常新常，总能引发不同读者在不同时段的不同思考。

当前我们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语境，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虽然每个视角都是一个认识鲁迅的独特窗口，不同观念之间存在对话、交流、借鉴、共生的关系，但不同“元”之间并非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经常出现一种充满协商乃至博弈的关系，所以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仍然是无法避免的。

李何林先生说：“对鲁迅作品接触较多的人，有责任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普及给对鲁迅了解较少或者有所误解误读的人。”我理解这就是他所谓“保卫鲁迅”的真谛。

## 小说

# 跑步爱好者

□朵拉[马来西亚]

他是个跑步爱好者，大家都这样

说。每天清晨，他穿上轻便的运动鞋，沿着滨海公园的跑道，迎着晨风，脚步轻快。他似乎享受这份自由，像一只在薄雾中掠过湖面的水鸟。

其实，他并不那么喜欢跑步；他喜欢的，是跑步中的安静。每当他奔跑在清晨微凉的空气里，耳边只有风声和鸟鸣，内心空灵澄澈。

而在家中，这样的宁静是奢望。

“早餐放在桌上，记得喝完牛奶奶！别像上次那样剩一半！”

“你看你的鞋子，又乱放在门口，等下被我踢到！”

“孩子明天家长会，你去还是我去？”

他听见妻子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一句接一句，无穷无尽，像水滴落在石头上，起初只是轻轻敲打，时间一长，竟成了沉重的负担。

于是他出门了，呼吸带着海腥味的清新空气，阳光穿透树影，洒在他脸上。他甚至不再急着跑，有时干脆在长椅上坐一会儿，闭上眼睛，听风吹过树梢，看晨光洒落树叶。

这样的闲适只是暂时的。他总

要回家，回到那个永远有声音、永远有叮嘱的世界。

日子久了，他的跑步时间越来越长。妻子问他为什么最近跑这么久，他笑着说：“锻炼身体嘛。”

她叹口气：“也好，别到老了三高一身病。”

然而那天晚上，他正准备换上跑鞋，妻子忽然从厨房探头：“这么晚还出去跑步？早上不是刚跑过？”

“嗯，最近状态好，多练练。”他笑着解释。

他快步出门，夜风凉爽，他跑得更快。脚步声轻盈，仿佛要摆脱身后的一切。

而在家中，妻子继续忙碌着，收拾着他留下的茶杯，叠好他换下的衣服，挂上。他不知道，妻子也曾站在窗前，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手上忙着熨烫他的上班衣服，低声叹息：“我也想要去跑步。”

第二天清晨，朋友在跑道上又遇见他，笑着调侃：“真羡慕你，每天坚持跑步，精神那么好。”

他也笑了，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是啊，我喜欢跑步。”

只是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下决心——从明天起开始去跑步。

# 通灵的小刀

□刘利元

真的，我曾经拥有一把通灵的小刀。

这把小刀是我在交流会上买的。按说，我是没有钱买小刀的，可是妈妈给我钱了。具体是这么回事儿，妻子收割后，公社组织夏季交流会，我也很想去看热闹。掀开柜子找钱，零钱一张也没找到，在柜底找到一张十元的。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好笑，十元不就是零钱吗？不是的，在我上小学时，十元是最大面额的钱。我本意是找一张五毛的或者一块的，连两块和五块的都没敢想。

怎么办呢？不拿吧，在我心里痒痒。拿吧，怕挨揍，更怕弄丢了。经过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最终还是拿了，准确意义说，应该是偷。装在衣兜里，感觉衣兜很浅，怕把钱掉出去，又用针线把兜子密密地缝上。到了交流会上，没敢买东西，更没敢拆开衣兜。甚至连交流会上有什么东西，也迷迷瞪瞪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守护衣兜上了。这十块钱虽然完整无缺地带回了家，但我衣兜上的针脚还是引起了妈妈的注意。在我全部坦白后，妈妈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去交流会买东西。

之前是有钱不敢花，现在有钱，却不知该买什么了。目光游离地来回穿行，忽然看到路边一个摊子上闪烁金光，我凑到跟前，原来是卖刀具的。摊主在地下铺了一张蛇皮袋，蛇皮袋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刀子，有长长的杀猪刀，有窄小的杀羊刀，还有宽厚的切菜刀，而我看到的那个闪光的东西，是个子弹壳。小孩子心性，觉得非常好奇，拿起来仔细观看。原来子弹壳是个刀鞘，里面藏着一把精致的小刀。

设计非常巧妙，轻轻转动几下，小刀就从里面旋转出来了。小刀的尾部有螺纹，对准子弹壳的口子拧，再旋转几次，就拧在一起了，原来的刀鞘变成了刀柄。价格也不高不低，正好是两块钱。我付了钱，把小刀装兜里，一路上用手紧紧捏着，跑回家了。

这把小刀特别厉害。用来削铅笔，就像切豆腐一样。不像平日买的削铅笔刀，要么卷刃，要么吭哧吭哧半天，铅笔头折断几次了，还削不出笔尖来。为了试验它的锋利程度，我找一本旧书放在桌子上，用力往下扎，竟然把几十页纸全部戳穿了。刚开始，我时时向村里的孩子炫耀，自告奋勇帮人家削铅笔或者削其他东西。到后来，怕

# 周涛的“铜月亮”

□尹广

周涛是我在新疆军区结识的良师益友。他去世近两年，我时常读他送给我的书。最近细读他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其中《铜月亮》一文让我爱不释手。

读《铜月亮》，我最大的感触是：月亮不再是天上的抒情符号，而是一块被时间、被风沙、被人的目光“铜化”的硬壳——它既照亮，也压得人发疼。

周涛写月亮：“月亮”，有人指着喊。他要不喊，没准儿有人以为炼钢厂把钢水浇错了地方呢。多么不像月亮啊，那么一滴，金黄透亮的溶液，岩浆似的，钟乳石似的，流动在墙凹的容器里。眼看着它在动，填满、溢出，仿佛在一个看不见的轮廓里满溢，看着就要流过头了，就要造成残缺了，就不可能填得圆满了，不料它巧妙，在露呈轮廓的一刹那，一笔补救成浑然天成的完美。

他摒弃了传统文学中柔美朦胧的月亮意象，创造出独具锋芒的“铜月亮”。这月亮，带着戈壁风沙打磨的粗粝质感，泛着冷兵器时代的金属光泽。他描写月亮：“它既不是一钩斜挂，也不是‘天上一轮才捧出’的皎洁，而是像一枚出土在长城墙上的红铜古钱，烧红熔化，渐渐在冷却。然后，它嵌在了凹墙里。”他写的月亮，不是“皎洁”“温柔”，而是“古币”“开元通宝”“五铢钱”，像长城的城徽，也像历史的纹章。于是，月亮不再是李白、苏轼的月亮，而是“那样一种优质的纯铜的红黄，色泽异常辉煌明亮，却并不耀眼”，“渐渐滴出一滴烧红的铜汁来，填充在凹墙里。金红透亮，钢水似的散发着炽烈的光辉”，“这红光渐渐被周围的天空吸收，使它冷却，还原为青铜古币，皈依沉静了”。

更触动我的是他对“看”的反思。传统诗里，人仰望，月俯视；周涛却写：“最后，它全部升起来，悬垂城上，晚照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纸本设色) □杜大恺

## 新诗台

### 徒然集(二则)

□浪子

一  
在茫茫的尘世，看着一个手提灯笼的孩子  
仿佛看到我自己：一切都是易碎的。  
那是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诗人说过，  
歌者唱过，更多的是在阴差阳错中走过的。  
走过的人，早已忘记自己曾经走过。

我为什么现在还在走？隔着茫茫的酒桌。  
二  
白露一过，秋雨就滴滴答答下来了。  
在凌晨五时，酣睡的人还在酣睡。  
时隐时现的雨声，刺破南方的梦境。  
无从再度入眠，我起身拿笔记下：  
人生的苦痛已见到太多，我不想  
再一一经历，而身体正奔赴其中。